

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吕臻

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时而大气磅礴,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时而隽永秀丽,韵味无穷;时而朴实无华,却富含哲理。毛泽东的著作是党的优良文风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他常常在会议、谈话中提到改进文风、写好文章此类话题,这是他丰富写作实践背后的沉淀、升华和总结。

一、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因为它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毛泽东谈到:“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化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这样要求领导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早年办《湘江评论》时,预约的稿子常不能交齐,他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一个多月内,写了四十篇文章。大革命时,他背着雨伞走村串户调查数月,不畏劳苦,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调查报告,为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毛泽东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

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则。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靠“毛泽东的文章”。他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仔细”,还经常为公文改错。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写报告和讲话稿让秘书代劳,毛泽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二、写作态度:实事求是

毛泽东说:“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住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生动活泼”,因为列宁“把心交给别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做人贵在真诚,作

文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张文章“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分析情况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不要尽是讲好话。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早年他在中央苏区写下的七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党基层调研工作的典范。毛泽东对这次调研印象很深刻,新中国成立后曾回顾说当时是“下大力气”。

三、写作方法:材料与观点统一,辩证分析

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告诫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与观点统一”,要把材料经过大脑的加工,贯通起来,形成自己的系统看法。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工,要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毛泽东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拿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1957年12月

25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文章写不下去了,此时应该多看看材料,再考虑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真懂。”他曾看过一份文件后不满意,认为文件起草者对所论问题“不甚内行,还不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他认为,构思写文首先要分析所论事物对立统一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运用方面存在着混乱状况。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要求规范语言的使用,强调写文章要讲文法、修辞、逻辑。讲文法,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讲逻辑,是指“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要有逻辑性”,“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也就是说要注意文章的准确性、条理性和前后的一贯性。

四、写作风格:要讲究文法,有中国气派

毛泽东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他的语言精炼准确,词汇丰富多彩,用典生动恰当,他的文章既有思想的力量,也有艺术的感染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运用方面存在着混乱状况。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要求规范语言的使用,强调写文章要讲文法、修辞、逻辑。讲文法,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讲逻辑,是指“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要有逻辑性”,“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也就是说要注意文章的准确性、条理性和前后的一贯性。

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毛泽东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尤其反对一些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主张要吸

收祖国语言几千年来丰富营养;他批评有些文章“洋腔洋调”,主张中国人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五、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

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有多方面的阐述。“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1957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看后,将其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并批了一句话“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

对于文章的开头,毛泽东主张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引起读者注意,然后再作阐释论述。他反对一些文章一上来就大段引用经典论述,给人以距离感,认为“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

在文章的语言上,毛泽东主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

关于文章的叙述方法,毛泽东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

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六、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文章写完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毛泽东认为还不行,还得去修改。

为什么一定要修改文章呢?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毛泽东还主张,“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可见,改文章就是改思想,改的过程就是思想完善的过程。

毛泽东一生改过的文章无数,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前后修改了十几遍,持续近半年时间,倾注了许多心血。

对自己的诗词,毛泽东也常会反复斟酌修改。1952年,一位大学老师写信指出《长征》诗“腾细浪”“金沙浪拍”两个“浪”字重复,犯了诗作之忌,建议改为“水拍”,毛泽东欣然接受,并称其为“一字师”。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明白,文风好坏与党的事业的兴衰密切相关,“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文风是一名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重要表现,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出现毛病,往往在文风上会有所表现。(摘自“人民网”)

淞流东渐 紫气西来

郑志瑛

2021年8月16日,邯郸市委张维亮书记在邯郸市第十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做大做强中心城区。传承‘淞流东渐,紫气西来’山水格局”。把最具邯郸地望特征又长期被关注的丛台刻石正式推向世人面前,站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上为邯郸加快建设富强文明美丽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擘画了山水蓝图。

“淞流东渐,紫气西来”刻石,敬献于邯郸武灵丛台西垣,由著名的爱国军事家胡景翼题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从书法艺术上看,八个大字写得清人赵之谦《颜底碑面》之精髓。用笔以圆为方,笔力沉实,笔致含蓄;结字庄重饱满,斜画紧结,谨严里带着浪漫。八个字字大经尺,魏碑、颜楷相揉参半,一股宏逸郁勃之气回荡其间。高桂滋、王琴堂本《邯郸县志》(1933年版)谓其:字仿六朝,虽非古物而锋棱整洁,颇觉古气郁盎。

胡景翼化用老子“紫气东来”典

故,把“东”改为“西”。这不仅使得紫山之西与淞流之东在文法上对仗,而且点石成金,生动形象地呈现出邯郸独有的紫山西望之祥瑞之象,使赵郡邯郸的山水之景融为一体。“淞流东渐”意为淞阳河的流水缓慢地向东方流去,“紫气西来”意为紫山的祥瑞紫气从西面向邯郸传来。一山一水,描绘出了从武灵丛台所见的古都盛景。“淞流东渐,紫气西来”刻石为胡景翼于1922年6—9月间,在邯郸牵头修复武灵丛台时所题。1922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胡景翼任第一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率部到河南援助直系,直系败

后曾驻河北正定、邯郸一带。

胡景翼(1892—1925),字笠僧,又作励生,陕西富平人。胡景翼的父亲胡彦麟,颇识文墨,侠义豪爽,常与著名学者章太炎往来。胡彦麟有六子一女,胡景翼为长子。胡景翼深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投笔从戎。他参加了西安起义,促成了北京政变,是辛亥革命时期北方的著名军事家。他主政下的河南省达成了国共两党合作,践行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苏联,投向了年轻的中国共

产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逝世,胡景翼悲痛欲绝,右臂疗疮大发,病情急剧恶化,于1925年4月10日溘然长逝,年仅34岁。

刚刚闭幕的邯郸市第十次党代会在全面谋划全市长未来发展的同时,对中心城区建设提出了“构建‘太行为屏、淞水绕城、环戴绿廊、十字轴带、满城园景’的空间形态”,为全市人民描绘了纵横百里的宏大天际线,富强文明美丽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形象呼之欲出!重温“淞流东渐、紫气西来”题刻的历史掌故,叫响邯郸独具特色的“淞流东渐、紫气西来”秀美地望,此其时也。



图为邯郸武灵丛台西垣“淞流东渐、紫气西来”题刻。

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王洛

一名密探闯入会场,使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由李公馆更改至嘉兴游船,是建党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1921年7月30日晚幕降临之后,作为会场的李公馆餐厅又聚集了众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了。周佛海忽然腹痛,独在离此不远的代表住处博文女校休息。晚上8点多,代表们刚在大餐桌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问道:“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退出。

在欧洲、东南亚进行多年斗争的老江湖马林,射出警惕的目光,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简要答复。

马林手掌猛击餐桌,当机立断:“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

上海作家叶永烈为撰写《红色的起点》,找到曾经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薛琳莘。

原来,这位密探并非泛泛之辈,他正是薛琳莘的老上司程子卿。薛琳莘回忆,这是程子卿本人对他说过的。

程子卿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主要官员,而且长期担任主管租借内政治性事件的政治部主任。他出生于1882年,镇江人,18岁赴上海做码头工人,并成为了漕工社团组织青帮悟字辈成员,结识了结拜大哥黄金荣。

1905年,经身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大哥照顾,程子卿当了巡捕,因为念过初中,为人机敏,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随着法租界

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组,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程子卿的妻子,名叫杨景德,两人都是天主教徒,育有两女一子。他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也有着私人交往,还被发展为国民党党员。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主管法租界政治事件的几十年,程子卿一直是以左翼同情者的立场行事的!他与宋庆龄交往甚好,通过自己的职权,曾协力掩护大量上海的红色人士。为此,还曾经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与憎恨,引来杀身之祸。1931年至1936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恐吓信,最后两次附有一颗子弹。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上升到刺杀。程子卿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幸而未中弹。此后,上下班时,只能由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

薛琳莘的回忆,还为我们补充了一个历史谜案的答案,中共一大的会

址是如何暴露的?原来,作为共产国际的要人,马林早就被一路上来的各国势力盯上了,其行踪也早被通报给了北洋政府与法租界。法租界早就获悉共产党将在此集会的消息,因为来头不小,所以身为探长的程子卿亲自出马,果然摸查到了马林的踪迹,跟踪几天后,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据薛琳莘讲,程子卿是有意放跑的共产党人。程子卿闯入会场,等于通风报信。跟踪马林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如果程子卿想将开会的人一网打尽,他用不着打草惊蛇,直接通知巡捕房开警车捉人就是,与会者一个都逃不掉。15分钟时间,足够让与会者从容撤离并且让程子卿对巡捕房有所交代。

上海解放后,程子卿曾受到审查。蒙宋庆龄力保,没有遭到冲击与处理,说明当时对他进行过甄别。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岁。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张陈旧的借据,诠释的就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与使命。作为新时代的银行工作者,我们生逢盛世,理应承担时代。我们要从红色金融历史中汲取勇气,从革命前辈的金融实践中获得启示,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革命文物是传承红色历史,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载体,我们要守护好老一辈金融工作者留下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经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单位:办公室)

老借据 新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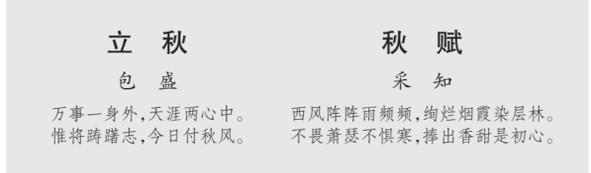
杨婧

在冀南银行纪念馆的陈列柜里,有一张写于1945年6月29日的老借据,纸张斑驳,但字迹清晰:“立贷人陈群相因买驴需款,今贷到冀南银行钞票叁仟元正,每月按一分五厘行息,以三个月为期,满将本息交清……”。镜头把我们带回到76年前的那个夏天,村民陈群相想买一头驴在农闲时跑点运输增加收入,但苦于无钱买驴,一筹莫展。村长王辉宗了解情况后向他介绍了冀南银行的贷款政策,陈群相大喜,立刻向冀南银行提出申请,最终以土地作为抵押,在村长

和村主任的担保下,成功借到了买驴款3000元。

这张“买驴”借据还有其特殊之处,不仅贷款额度小,用途还是购买活物,今天的商业银行往往不胜其烦而难以做到,而红色银行早已做到了极致服务,普惠小微,惠农助农,令人深思……

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源流之一,被誉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曾是“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1941年,冀南银行的经营原则从“以支持战争为主”,逐步转向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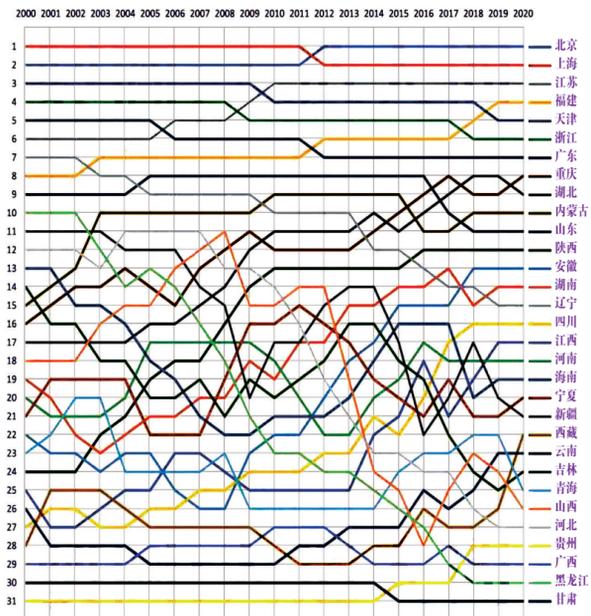
万事一身外,天涯两心中。惟将踌躇志,今日付秋风。 西风阵阵雨频频,绚烂烟霞染层林。不畏萧瑟不惧寒,捧出香甜是初心。



秋之韵(书法) 怀君 书之妙道(书法) 庄子晨

31省区市人均GDP排名变化图

制图:人造人



注:人口数据按照七普结果计算